

1997



爱我香港

四川民族出版社



97

●赵祝武 刘迅 主编

爱我香港

●张效民 刘晓明 刘根平 编
●刘志山 罗楚春 徐海风

四川民族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 张 京

封面设计 李文忠

技术设计 席 玮

爱 我 香 港
ai wo xiang gang

张效民等 编

※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码:610012

四川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5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09—1916—7/K·160

定价:7.80 元

编 委 会

顾 问

黄水桂 邱 玫

主 任

赵祝武 刘 迅

副主任

李忠俊 田柳青 陶广放

编 委

张效民 刘晓明 刘根平 刘志山

罗楚春 程 效 关志刚

引言：香港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香港以很高的速度走在世界新兴工业经济地区的前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获得了“东方之珠”的美誉。

香港的“经济奇迹”在国际上，特别在亚洲引起了广泛重视。近年来研究香港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还倡议建立一门“香港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要知道香港现在是什么样子，还要知道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样子；不仅要了解香港腾飞的过程，还要探索它持续高速发展的规律。

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概括介绍香港的情况。

一、世人瞩目的“东方之珠”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亚洲东部出现了。

从世界地图看中国漫长的海岸线，香港只不过是一个几乎看不到的“小黑点”；然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它以较短的时间、惊人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脱颖而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很突出的一个新兴工业经济地区，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是“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典范”。一位作家谈到这种现象时说：近几十年每次来香港，都看到一些为之目眩的新景象。“香港奇迹”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一颗“东方之珠”璀璨夺目。

“东方之珠”奇迹般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香港自然资源贫乏，却富甲一方。香港土地贫瘠，矿藏稀少，却拥有大量经济资源（资金、人才充足，信息灵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1947年至1987年的40年间，香港人均生产总值实际增加10倍。英国花了两个世纪（1750—1950年）才取得同样的成绩；美国从1840年至1960年的120年间，人均生产总值也只提高8倍左右。1989年香港的人均生产总值为10,939美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

2. 香港面积很小，能量却很大。香港只有1,092平方公里和631万人口，而它在国际市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却比一些面积和人口多于它几十倍的国家还大。现在的香港是著名的国际金融、贸易、轻工业、航运、旅游、信息中心。它同170多个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有8种产品出口值或出口量名列世界第一。1989年香港的对外贸易总值高达11,332.91亿港元，超过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它除了是中国大陆的最大投资者外，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台湾和马来西亚，也都有大量投资。

3. 香港是英国人当作“殖民地”来统治的地方，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经济自由。香港是当代世界最开放的自由港，商品、外汇、黄金、人员进出口自由，企业经营自由，对外来资本和本地资本一视同仁，被誉为“自由经济的圭臬”。全世界100家最大银行中，有77家在香港设有分行。这里可以买到

比原产地价格低廉的各国商品，有“购物天堂”之称。

4. 香港竞争激烈，却容易赚钱。香港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国际资本争夺市场的搏斗虽然残酷，但投资回报率很高。这里背靠中国大陆，面向国际市场，法治也比较健全，赚钱的机遇不断涌来，谁有能耐谁就可以发财。在香港，富翁很多，据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报道，在全球 141 个拥有资产 10 亿美元以上的世界级巨富中，香港人占了 6 个，按人口平均计算，所占比例是最大的；此外，在各行各业中，都有不少亿万富翁。这些富豪和富翁，有些人是继承祖业，但也有许多人是白手起家的。这种情况大大激励了香港人创业致富的拼搏精神。这些特点和成就使香港成为一颗耀目的“东方之珠”。它不仅鼓舞了许多小国、穷国，也引起一些大国、富国的关注。菲律宾政府要在宿务省开设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泰国要在泰南五府设置“香港式”的自由经济区；日本要在琉球群岛的那霸开辟自由贸易区，使之成为“第二个香港”；苏联曾计划在苏、朝、中三国边境的哈桑地区创设它的“远东香港”；韩国也宣布把济州岛建成“第二个香港”。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各有自己的意图，它们的主观愿望不一定都能实现，但这些事实说明，许多国家、地区对香港的成功经验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主义中国对香港的经济成就也给予充分肯定，邓小平说，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中国的改革要更大胆些，要比过去更开放。

二、“香港奇迹”产生的四个阶段

要理解“香港奇迹”和它出现的原因，须回顾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

香港经济的发展不是一步登天或一蹴而就的。有如鲤鱼跃龙门，它在战后 40 多年来跳越了三道险滩。每次都曾出现剧烈的经济波动，仿佛已到山穷水尽之境，但是在过滩以后却又柳暗花明，经济发展提升到比前一阶段高得多的水平。以这三道险滩为分界线，战后香港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特殊情况，因而也各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策略。

第一阶段（1946—1952）：战后复元和转口贸易恢复。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重大，对外贸易几乎全部停顿，工业生产也告萎缩。但是，战后数年间香港就能恢复原来的转口港地位，对外贸易额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在外贸带动下经济得到全面恢复，1947 至 1951 年间每年平均增长 35%。

恢复迅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香港对中国内地贸易额的激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急需需要加强对外经济联系，而英国也作出了明智决策，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国。香港企业家掌握这个机会，扮演了中外经济联系中介人的角色，使香港对内地的贸易额在 1949 年和 1950 年中分别上升 66% 及 74%。

在这一阶段中，经济结构仍然同战前一样以转口贸易为主，工业只略有起色，金融业亦限于商业银行的零星业务。对应此种情况的经济策略，是充分利用优良港口、各种基础设施以及国际贸易关系网，从转口贸易和航运中获利。

第二阶段（1952—1970）：工业化阶段。

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使香港经济猝然陷入危机，转口贸易一落千丈。对内地贸易额迅速下跌 2/3，1951 至 1955 年，中国内地在香港出口市场上的地位从第一降为第五。受此打击，金融、保险、航运等行业均不景气，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失业

人数骤升，社会秩序不稳。此时的香港曾被称为“消失中的城市”。这是香港战后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道险滩。

香港人善于掌握机遇，调整策略，很快就能够找到出路，转入工业化阶段。他们以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成衣等业为先驱，充分运用来自上海等内地城市的资金和人力，积极开拓欧美市场，在 50 年代短短七、八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工厂和佣工数目分别增加到 3 倍和 2 倍，新的工业区在港九纷纷兴起。到 50 年代末，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全港出口总值中的比重高达 7 成，这是香港已从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城市的标志。

工业化成功的背景，主要是战后世界经济局面的变化。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着重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这就为劳工成本较低的香港轻工业制品提供了广阔市场。其次，中国政府一直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从政治上稳定香港，从经济上支持香港，也是香港工业化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阶段中，经济结构变为以轻工业及其产品的外销为主，经济策略采取出口导向型，根本改变了过去 100 多年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老路。香港走上出口导向策略的道路比台湾早六、七年，比韩国和新加坡早 10 多年，所以香港工业化初期港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对手较少。在将近 20 年的工业化阶段中，或因欧美经济不景气（如 1957 年），或因受中国大陆“文革”的影响（如 1967 年），香港经济发展虽也曾出现波折，但都能够很快恢复增长的势头。

第三阶段（1971—1981）：从工业化走向经济多元化阶段。

从 60 年代晚期起，采取出口导向型策略的新兴工业经济地区逐渐增多，竞争日趋剧烈。台湾、韩国的出口额均在 70

年代前期先后赶上香港。与此同时，发达工业国家有经济衰退迹象，保护主义抬头。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冲击下，香港经济发生巨大波动，出口市场萎缩，1974 年实质出口额减少 7%。工厂开工不足，小厂更纷纷倒闭。1973 年股票市场大泻，跌去市值 7 成以上，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一片淡风，人心惶惶。香港面临着第二道险滩。

同时遭受冲击的新兴工业经济地区中，有的落伍了，有的放弃了外向型经济策略。香港同亚洲其他“三小龙”采取不同的应变策略，先后渡过难关，在发展道路上继续奔驰。

香港因为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作用发挥得较充分，所以恢复较快。它推行经济多元化方针，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变化。首先是推行工业多元化，以生产高增值商品来应付欧美各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又以市场多元化来应付竞争对手的挑战；然后实行经济多元化，使多个经济部门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以扩大香港经济的基础。70 年代是香港金融业、旅游业及房地产业兴起和迅速发展的时期，香港成为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经济在 70 年代后期的表现优于台湾和韩国，中国因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78 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香港金融业、旅游业、转口贸易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多元化策略的成功。1977 年至 1981 年间，50 多万内地人移居香港，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加强了香港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四阶段（1982— ）：从经济多元化走向经济转型阶段。

这个阶段从 1982 年开始，现在还未结束。80 年代初，由于世界经济出现衰退，香港主要贸易对手大多采取更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国际市场上的出口竞争也更加剧烈，因此香港出

口困难又大大增加，制造业出口额和就业率都下降了。1981年房地产业市道不景气，金融业受到沉重压力，积压的资金据估计达 500 亿港元。加上部分香港人对香港前途信心不足，投资缓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 1980 年的 19.7% 降到 1982 年的 1.7%。这是香港经济发展中的第三道险滩。

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香港前途转趋明朗。在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同大陆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的有利形势下，香港人齐心协力开创了新局面。

首先，经济多元化更见成熟。金融、旅游等行业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转口贸易重新兴盛，连年大幅度上升，到 1988 年已超过港产出口，占出口总值的 56%。1989 年上升为 60.7%。制造业大量北移到珠江三角洲，雇用人数超出香港制造业雇工数 1 倍以上。内地的低廉生产成本再次提高了香港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经济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各个主要行业提供的国际性服务愈来愈多。国际资本对香港越来越重视，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进入香港与日俱增，连原已撤离的英国本土财团也重返香港。同时香港财团也大量投资海外。

再次，工业转型经过长期酝酿后也于 80 年代中期开始起步。从设立科技发展委员会、筹建科技大学等措施来看，香港政府对发展科技与工业转型的态度也转趋积极。

上述的新发展加速了经济增长，增长率自 1986 年起连续三年高速发展，使香港经济达到新的高峰。

从经济增长的实际成就看，若以 1955 年的实质生产总值为 1，则 1970 年为 3.7，1979 年为 8.5，1988 年为 16。可见香港每在前进路上跨越一道险滩，生产总值就有成倍或多倍的

增长。香港近 40 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波浪式的，在经济结构上则是由简单到复杂，从转口贸易一花独放到今日的多元化，制造业、金融业、对外贸易（包括转口贸易）以至旅游业、房地产业等百花竞放。

从上述历史进程来看，“香港奇迹”的产生是一部开拓创造的历史。我们相信，香港回归后必将给其带来更大的繁荣和发展。

三、“香港奇迹”产生的原因

1. 外部原因

外部因素是指香港以外世界大局的变化及其对香港的影响。香港社会经济是个开放程度极高的系统，商品、资金、技术、信息……等等同世界各地的交换是很频繁的，因此外部因素在香港的变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特别重大。如上节所述，在 40 多年来香港历史发展的几个转折关头，外部因素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由于内部因素的复杂变化，在每个转折关头上香港的发展前途往往存在几种可能性，而正是外部因素的作用使其中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例如，香港在 50 年代初期处于或是衰败下去或是从工业化中找到出路的十字路口，在它最后完成从转口港向工业城市的转变中，国际贸易新动向等外部因素，便成为具有决定性的条件。

从世界体系观点来看，香港发展的外部因素可以归纳为两大项：

（1）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出现新的形式，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生工业转移，简

单加工的轻工业被分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于是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得到推行出口导向策略、积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机会。战后新兴工业经济地区（NIE）多数是由此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香港正是较早走上这条道路的新兴工业经济地区之一。

（2）社会主义中国同香港的紧密关系。香港与中国内地有天然的经济联系，历来是通往中国大陆的门户。近 40 年来，它更在社会主义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与西方大国对这一点的共识，使香港 40 年来在周边国家（地区）动荡的环境中能够保持政治和社会上基本稳定。中国政府一直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通过各种方式支持香港的发展。从上节的叙述可见，在战后香港越过几道险滩的过程中，中国因素每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外部因素对香港发展的影响是有两重性的，除了正面作用之外，还有负面的作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如 1973 年），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出口市场。在西方大国与中国出现尖锐对抗（如 1951 年禁运）时，或在中国大陆局势严重变动（如 1966 年）时，香港经济都会受到剧烈的冲击。不过，从香港经济起飞以来，外部因素对香港的影响总的来说还是以正面作用为主的。

2. 内部原因

香港成功的内部条件比较复杂，可以归纳为下列三大项：

（1）地理环境。香港的地理环境有其独特的优势。它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既背靠中国大陆，又当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运要冲，是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不论由东而西或自北往南，香

港都是中途站。它还拥有优良的海港，维多利亚港水深港阔，终年不结冰，是世界上最优良的三大天然深水港之一。凭借这一优势，香港便发展成为远东贸易运输的重要枢纽和中国对外交通的南方门户。香港地理环境也有一些劣势，如可用土地资源不足、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等，增加了香港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不过，处在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劣势是可以弥补的。

(2) 历史背景。整整 100 年（1841—1941）的转口港时代，为战后香港迅速发展准备了不少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近代华人社会的形成。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在转口贸易中崭露头角的华商便已在财富上超过外商，轩尼诗总督曾透露当时港府的税收有九成得自华人。华人社会所代表的这股新兴社会力量（包括企业家和劳动者）在殖民统治下长期受到抑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国际和中国新形势下得到扩大与加强，成为香港经济腾飞的重要角色。人们公认，香港华人的才华，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港人凭着出众的才华，加上勤奋、拼搏的创业精神，不断为香港创造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业绩。此外，还有在英国影响下形成的法治环境和自由企业制度，运输、通讯、金融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长期积累和建立的贸易经验和国际联系等，都是在这百年中逐步形成战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有利条件。

(3) 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因素。将香港社会同新加坡、台湾、韩国进行比较，可以看到香港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既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地区的共性，又有香港自身的个性：

①香港经济是以自由港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功能充分发挥的外向型经济。亚洲“四小龙”都实行市场经济，又都先后采

取出口导向策略；区别在于香港和新加坡是以自由港制度为基础，而台湾和韩国则不是。此外，香港和其他三者不同，从未采用进口代替策略，工业化一开始就将产品投向国际市场；香港市场机制功能也发挥得较其他三者更为充分。

②香港政治对经济关系的特点是，有一个高效率而少干预的政府。“四小龙”的政府都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而且都是以技术官僚为骨干，效率较高。区别在于政府在经济管理中扮演的角色不同。香港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尽量少干预经济，一般只在市场失效时才出手干预，不像其他三者那样强调政权调节，由政府积极介入经济事务。

③香港文化的特点是中西文化交汇。“四小龙”在不同程度上都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在接受外国文化影响方面，香港、新加坡是以英国为主，与台湾、韩国不同。近年来香港文化结构趋向多元性和国际性，中西文化交汇更为显著，表现为社会上既有和谐，又有竞争；既重家族主义，又重个人拼搏精神；既重伦理价值，又重物质价值，等等。

上述各项共性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成功模式和构成因素，而香港的一些个性则是它在国际竞争中占有的优势，这是我们在探求“香港奇迹”产生原因时所不应忽略的。

3. 内协调、外适应的调节机制

(1) 内协调。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是互相促进，协调运作的。6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的急速发展，促成了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家庭制度的变迁、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华资财团的崛起、中产阶层的成长等等），要求政治体系与文化结构同经济协调发展。而政治、文化的相应变化，反过来又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近二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

“行政吸纳+文官系统+咨询民主”的港式政制，把社会新兴力量的代表吸纳到行政体制圈内，提高了行政机器的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中西汇合的香港文化培养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大量“精英”人才。在香港广大居民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法治观念和商业功利主义意识都已深入人心，这些观念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孕育出香港同胞刻苦创业、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同自由竞争机制相辅相成，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这种运作中，香港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每一方面都贯串着政策的作用和人的作用的平衡协调。政策恰当与人的素质提高同是香港成功的重要条件，不可偏废。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英国管治下、主要由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所以，中、英两国在香港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政策对香港的繁荣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外适应。在长期开放的历史中，香港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迅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功能；不论外部因素所起的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香港都能比较灵活地顺应和对付。这种功能在经济方面表现最为突出。香港企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机动性很强，能够根据利润高低及时调整资源调配，不断改变经营方向以适应国际市场上需求的变化，在剧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能够在有利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香港的工资、价格体系弹性很大，市场机制有强大的自发调节功能，因此在不利的世界经济形势冲击下能够发挥自我平衡的作用，较快地从波动中恢复稳定。近30年来世界经济发生过几次不景气，香港经济的恢复都比邻近地区快。

位处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香港，既能从双方交往中获得利益，也常常因双方关系的重大变化而受到打击。但是它善于适应有关各方面对香港的政策，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求生存，并且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中立地位，使香港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为香港的持续繁荣提供了重要保证。香港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性混合文化，许多居民通晓中、英两种语言，既了解西方世界又熟认中国内地情况，这些也是香港适应复杂的国际环境的重要有利条件。

内协调（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和外适应（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联合形成香港社会一种内在的自发调节机制。它包含着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非常复杂。“香港奇迹”的产生，就是这一系列复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许多因素都是产生“香港奇迹”的必要条件，单纯强调其中一项或某几项因素，都不能全面说明“香港奇迹”的产生。

四、香港社会的弊病与发展前景

1. 混藏在珍珠中的垃圾

尽管“东方之珠”璀璨夺目，但是从多方面透视，仍会发现香港社会中的诸多问题。

由于香港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加上近年来发展很快，因而这里既有多年积聚的沉渣，又有不少新发生的问题。这就必然有许多弊病，与它的成就并生。例如：这里有全世界最多的经济自由，却很少政治民主；这里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同时是个国际情报中心；这里既有自由与法治等资本主义文明的精华，又有长期奴化教育和英资垄断财团享受某些特权